

批林批孔文章选编(第三集)

历史上的儒法斗争
对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影响

中医研究院理论学习小组 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批林批孔文章选编(第三集)

历史上的儒法斗争
对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影响

中医研究院理论学习小组 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文章选编（第三集）

儒法斗争对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影响

究院理论学习小组 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通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32页

197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71,000

统一书号：14048·3434 定价：0.22元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春秋战国	3
(一) 医和巫的斗争	4
(二) 在社会制度变革中产生的一部杰出医学著作——《内经》	8
第二章 秦统一中国——清代鸦片战争	14
秦——汉	15
(一) 秦汉法家路线对医药学的促进	18
(二) 唯物主义自然观与神学迷信的斗争	23
(三) 在法家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一部医学重要著作——《伤寒杂病论》	26
魏·晋——唐·五代	30
(一) 服石和炼丹对医药学的影响	32
(二) 医药学在不断地排除儒道佛的干扰中前进	35
(三) 唐代的法家路线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	39
宋——元	44
(一) 王安石变法对医药学的贡献	47
(二) 围绕着运气学说进行的斗争	49
(三) 创立新说与墨守古法的斗争	53
明——清 (鸦片战争前)	58
(一) 注重实践与崇尚空谈的斗争	60
(二) 在反对尊经崇古的斗争中创立了温病学说	65

(三) 尊礼教和反礼教在医药学领域中的反映·····	69
第三章 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前 ·····	74
(一) 反动派消灭中医和人民群众的反抗·····	77
(二) 在改良主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中西医 汇通派”·····	82
几点体会 ·····	88
(一) 劳动人民是祖国医药学的主人·····	88
(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 一切的·····	91
(三)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94
(四) 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努力创造我 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97
编后语 ·····	103

前 言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当前全国各条战线群众性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向着普及、深入、持久的方向发展。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批判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阵地，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有力地推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两千多年来，我国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影响必然也反映在各个学科领域里。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与科学文化发展的关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斗任务。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医药学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丰富的防治疾

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个伟大的宝库是我国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他们的生产实践决定着医药学发展的总进程。

在阶级社会中，医药学的发展受着整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制约，历史上儒法两家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的斗争，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法家革新、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观对我国医药学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儒家守旧、反动的政治路线和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先验论，则成为我国医药学发展的桎梏。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研究儒法斗争对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影响，正确评价法家路线对医药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局限性，揭露批判儒家孔孟之道对医药学发展的阻碍和破坏，认真总结医药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这对于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孔孟之道的反动性，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以促进我国医药科学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迅速发展，创造出我国的新医药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 春秋战国

(公元前 770 年～前 221 年)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大变革时期。当时，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主的统治日趋没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逐渐抬头，奴隶同奴隶主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风起云涌。如公元前 550 年陈国筑城奴隶的暴动，公元前 520 年“百工”造周王室的反，公元前 478 年卫国手工业奴隶暴动，赶跑了奴隶主头子卫庄公等。其中，最著名的以柳下跖(zhí 音直)为首的奴隶起义军，“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①。奴隶和平民的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摧毁反动奴隶制社会的决定力量。与此同时，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凭借着奴隶们反对奴隶制的高涨革命形势，也日益发展，并且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与没落奴隶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政治思想战线，集中表现为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

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以孔丘、孟轲为首的儒家，推行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反对一切变革，顽固地维护和复辟腐朽的奴隶制度。为此目的，儒家继承并且发挥了殷周奴隶主阶级的天命观。殷周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捏造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胡说有个天帝，他是上天和人世间的最高主宰，所有自然现象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受着天帝的支配，国君“受命于天”，是代表

天帝来统治人民的。儒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②的天命论，宣扬天能“赏善罚恶”，胡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③，用以欺骗群众，要人们安分守己，听天由命，服服贴贴地听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压榨，妄图凭借天帝的权威来维护他们已经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这种反动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对医药学发展的严重阻碍。相反，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如管仲、李悝（kūī 音亏）、商鞅、荀况、韩非等人，顺应历史的潮流，制定和实行了一条坚持前进、坚持变革的革新路线，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为新兴的封建制度代替没落的奴隶制度开辟了道路。他们坚持法治，重视耕战，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法家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天地是自然界，自然界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不能干预人事。荀况就是用“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观点来批判儒家“天人相与”的唯心主义观点，并且明确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④。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在当时鼓舞人们为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积极建立和发展封建制度而斗争。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建立了封建制度，社会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法家的进步思想政治路线，促使我国医药学得以较快地发展和提高。

（一）医和巫的斗争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反天命同儒家尊天命的斗争反映在医药学领域，集中表现为医和巫的斗争。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⑤同其它科学一样，我国医药学的起源和发展也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出来的。早在原

始社会时期，人们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即发现了不少可以治病的药物，在使用石器当中发明了用砭（biān 音边）石（针法的前身）治病，并从烤火取暖中发明了热敷法和灸法。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在奴隶创造历史的过程中，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与疾病作斗争的医药知识和经验也逐渐丰富起来了。另一方面，在原始氏族社会解体时期，由于阶级的分化，还出现了专门从事迷信活动的巫。巫除管祭祀祖先等活动以外，还用向鬼神祈祷等方式治病。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假托鬼神的意志，以巩固和加强对奴隶的精神统治，为此，在其统治机构中设置了“大祝”、“大卜”、“司巫”^⑥等官职，大肆宣扬鬼神观念和占卜、巫祝。一大批巫成了有权力的官吏，他们以祈祷、祭祀、占卜、诅咒等手段进行所谓“逐疫”、“驱疾”等欺骗活动。这样，就在医药学史上出现了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医药学与建立在鬼神观念基础上的巫术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在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促使医和巫的斗争也尖锐起来。不少医生用自己的医疗实践与巫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我国医药学不断沿着唯物主义路线向前发展。其中卓越的代表人物有医和、秦越人等。医和是春秋时代的秦国人，公元前541年，他受秦国的委托去为晋平公治病。医和见了晋平公，首先进行了详细的检查，认为他的病是由于情欲过度所致，而决不是由于鬼神降灾所引起的，并明确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的理论，用朴素唯物主义的病因说否定了唯心论的鬼神致病说。秦越人（人们又称他为扁鹊，勃海郡鄚人——今河北任邱县）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一个杰出医学家，经常周游各地为人治病。一次，秦越人路过卫国，恰恰赶上一个人

病危，秦越人打算抢救这个病人，可是患者的父亲迷信巫祝，求神保佑，拒绝秦越人的医治，最后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⑦。社会上这种信巫不信医所造成的恶果，促使秦越人在他的医疗活动中，坚决用医药知识反对巫术迷信。如他路过虢（guó音国）国时，虢太子患了“尸蹶”（jué音决）病，呈现假死状态，虢君束手无策，当时国中的人都忙着替虢太子祈祷消灾，把祈祷当作一件大事来办（“国中治穰过于众事”^⑧）。秦越人询问了虢太子的病状，断定虢太子还有微弱的呼吸和体温，并没有真正死亡。他和他的弟子一起综合应用了针刺、热熨和汤药等多种疗法，使病人转危为安。当别人称赞他能起死回生时，秦越人却实事求是地回答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⑨意思是说我不能让死人复生，这个病人并没有真正死亡，所以我才能把他挽救过来。秦越人正是在这种医和巫对立的社会现实中，形成了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从他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富有战斗性的“六不治”^⑩，反映了当时医和巫的尖锐斗争。“六不治”明确指出对于六种人的病没有办法治好，其中就包括“信巫不信医”的人，“骄恣不论于理”的人，“轻身重财”的人，这是对奴隶主贵族的骄横、贪婪、愚昧的深刻揭露，更是对巫祝迷信的公开挑战。秦越人的医术在当时来讲是很高明的，他擅长脉诊，并掌握了针灸、砭石、汤药、按摩、热熨等多种治病手段。他在各地为人治病，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有时作“带下医”（妇科），有时作“耳目痹医”（五官科），有时又作“小儿医”（小儿科）。秦越人在医学上的这些成就，反映了当时的医学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也是同有神论的巫术进行斗争的结果。

在医学与巫术的斗争中，儒法两家营垒十分鲜明。不畏

天命，要求革新，注重实践的法家，坚决反对巫术，重视和促进医药学的发展。而信奉天命，反对革新，轻视实践的儒家，则支持巫术，宣扬鬼神，对医药学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据《论语·乡党》记载：“乡人傺（nuó 音挪），朝服而立于阼（Zuò 音坐）阶”，就是说孔老二每在举行迎神逐疫的仪式时，总是要穿起朝服，恭恭敬敬的站在东边台阶主人的位置上主祭。《论语·述而》中还载有：“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丘之祷久矣’”，说明孔老二自己有病时就乞求鬼神保佑。有一次孔老二生病，季康子送给他药，他顽固地拒绝服用，连尝也不敢尝。他的学生伯牛病重的时候，他隔着窗口拉着伯牛的手，叫嚷什么“亡之，命矣夫”^⑩。意思是说“活不成了，这是命该如此啊”。由此可见，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是信巫不信医的典型。相反，法家对医药学，则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管仲在治理齐国时，主张国中设置“掌养疾”、“掌病”的官吏^⑪，还提出春季要挖除井中的积垢淤泥，疏通沟渠，排除积水等积极改善环境卫生的措施^⑫。李悝在魏国进行改革时，计算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其中就包括了医疗费用^⑬。荀况更进一步提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⑭，认为只要衣食充足，活动适应节气变化，天也不能使人生病。对于巫术，法家是坚决反对的，《管子》一书中就曾指出“上恃龟筮（Shì 音士），好用巫医”会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祸患^⑮。西门豹大破“河伯娶妇”的鬼话，把巫婆抛进漳河里。荀况也反对巫祝迷信，认为那是“浊世之政”^⑯。韩非更直接了当地指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都是行将衰亡的象征^⑰。法家对医药学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法家唯物主义革新前进的思想丰富了内容。秦越人主张有病早治，不要把小病拖成大

病的思想，曾受到韩非的高度重视，他在记述了秦越人的医疗事迹后，进一步引伸出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并把这种观点运用到他的政论方面，指出：“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⑩这说明，法家思想与我国医药学的发展有着互相促进的关系。

(二) 在社会制度变革中产生的一部 杰出医学著作——《内经》

春秋战国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我国医药学冲破了反动天命观和巫祝迷信的阻碍，得到较快的发展。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种医药学著作，现存的《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内经》这部书托名于黄帝，实际它根本不是黄帝作的，既非记述一时之言，又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汇集了先秦时期多种医学著作的内容，也有某些秦汉时人的增补。这部书总结了人民群众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的防治，奠定了中国医药学的理论基础。《内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医学摆脱了巫术迷信的束缚，逐渐形成了朴素唯物论的理论体系，它是这一时期唯物论战胜唯心论、医学战胜巫术的一部杰出著作，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⑪法家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古代自发的辩证思想，对《内经》医学理论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影响。《内经》里多处运用法家的军事思想来阐述医理，甚至直接引用孙子的《兵法》来讨论针刺问题^⑫，都是受法家思

想影响的明证。

《内经》在论述自然界以及生命现象时，基本上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反对唯心主义的天命观，这同法家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法家荀况反对天命观，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并指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②《内经》也认为天地是自然界，具有物质性的阴阳二气是产生万物的根源，并指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③《内经》正是从人体和天地都是自然物质的这个观念出发，在实际观察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脏腑经络学说和病因学说等等，并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阴阳五行学说来阐述人体内部的矛盾，各脏腑之间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的关系，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联系。从而形成了基本上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整体观念、发展运动观念的中医基本理论。《内经》把人体当作自然物来对待，认为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来了解人体结构和功能，反对那种神秘化的观点。它提出：“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④

《内经》记载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容量等等，尽管不完全正确，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形的。例如，按《内经》记载，食管长度与大小肠长度的比例是一比三十五^⑤，而现代解剖测量结果是一比三十七，非常接近。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⑥如果没有解剖的实践，《内经》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出上述的结果来的。《内经》在对人体结构和功能进行观察的基础上，用脏腑经络学说和精气、形神、气血、津液等学说来说明生命活动，并且已经有了血液循环的概念，认为血液是在血管内“流行不止，环

周不休”^②，这种认识在世界医学史上是居于最前列的。《内经》关于生命现象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也是对儒家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内经》在论述人体生理、病理、病因、诊断、治疗等问题时，基本上贯彻了无神论思想，反对有神论思想，这同法家也是一致的。《内经》明确提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③就是说，对迷信鬼神的人，没办法和他讲高深的医学道理，对讨厌针砭的人没办法和他讲高明的医疗技巧。这不仅划清了医学与迷信的界限，而且也是对迷信鬼神的儒家一个有力的回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内经》反对儒家的天降灾变以及鬼神致病的谬说，明确提出引起疾病的外来因素是邪气（邪是不正常的意思），邪气主要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反常的风、寒、暑、湿、燥、火，还有饮食不节、劳倦以及情绪不正常等也是致病因素。《内经》认为疾病的发生，不单决定于邪气，更主要的还要看人体正气的虚实，强调指出：“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④。又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⑤。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人体的正气旺盛，邪气就不易伤害人体，只有当人体的正气相对虚弱，不足以抵抗外邪，邪气即乘虚而入，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时才会发生疾病。《内经》更进一步指出：有时邪气潜入身体，当时没有发病，后来由于某种诱因，突然发病，因为“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⑥，其实并不是鬼神造成的。《内经》这些论述从病因学上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的鬼神致病说，确立了朴素唯物论的病因学说。

《内经》主张积极的防治疾病，闪烁着“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思想光芒。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